

立足文本:当前文学研究创新的着力点

欧阳文风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文学研究脱离文本,只热衷于演绎空洞泛化的理论,已成为我国当下文学批评及文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改变这种浮夸虚化的研究作风,培育一种人文关怀的意识,老老实实地立足文本,提倡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开放性的“细读法”,并尝试着建立一种充满现代性和原创性的感悟诗学,是我们当前文学研究创新的着力点。

关键词:文本;人文关怀;感悟诗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6-0730-04

吴义勤先生在《批评何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候》^[1]一文中,曾经对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现象进行了辛辣的批评:一是“文学批评的‘不及物’”;二是“文学批评的‘虚热症’”。文章指出,时下很多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虚化”、轻视甚至忽略批评文本,“许多批评不与具体的对象发生真实的联系,而只是把对象作为‘思想’或‘话语’的由头,使得批评悬浮在对象之上,永远是一种‘不及物’的状态”。“许多批评家有着深刻的思想、高深的理论、丰富的学识和聪颖的智慧,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作展示自己的舞台,而‘文本’只不过是踩在脚下的‘跳板’和过渡。他们的批评文字往往斐然,思想高深,但却与所评论的文本几乎没有有什么关系。”“批评家们失去了细致解读文本的耐心,而是热衷于发出各种夸大其辞的、耸人听闻的‘判断’”……吴氏在这里比较真实地描述了我国当前文学批评中的两种不良倾向:脱离文本,空洞泛化,并形象地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不及物”和“虚热症”。

进行文学批评而不看批评文本,这看起来是非常荒唐的事情。然而,这种事情竟然在当下整个批评界蔓延,成为了一种现象。也莫怪杨义先生曾经讽刺说有些理论家是吃干草长大的:“文学现象如满园春色,绿草如茵,而我们的某些理论家不去面对这些绿色的春草,而只习惯于咀嚼一些被晒干水分的概念性的干草,这大概算不上明智的做法。”^[2]是的,我们很难想象,不注重文本的文学批评对我们当前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众所周知,文学理论一定要植根于文学文本之中,如果文学理论不根植于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和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之中,文学理论所概括的文学基本原理、概念、范畴和方法,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文本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生成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西方许多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重视文本的文论发展过程,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与法国结构主义,等等。虽然这些文本主义文论思潮都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们为各自国家文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它们所创建和规范的范畴、概念、术语等,大都成为后来文论界交流的常规话语。

应该说,我们古代文论也是非常重视文本的,古代的诗话、序跋特别是明清之季的小说评点,都是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上对具体文本的感悟——这或许也正是古代“诗文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充满活力、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们的现代文论却在对西方文论的一劳永逸的借鉴引进中极端地忽视了对自身文本的感悟。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西方已经有了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我们取而用之又有何不可呢?确然,注重分析推理的西方文论在理论发展的完善和入思方式上,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借鉴,但西方文论最大的缺陷是,他们并没有把西方之外的文学实践和文学文本纳入到他们的视野,他们仅仅是立足于他们自己的文学土壤,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仅仅是西方的,不具有全球通约性。美国文艺理论家厄尔·迈纳

说：“西方文学及其众多熟悉的假设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只不过是一个特例，完全没有资格声称是一切的标准。”^[3]刘若愚也说：“一种文学中产生的批评标准未必适用于另一种文学。”^[4]因此，我们可以对西方文论进行某些借鉴却绝对不能照搬，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一定要建立在自己本民族的文学文本之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只有面对自己独特的文本，才会生成自己独特的具有原创性的文学理论来。靠因袭别人建立在他们的文学文本之上的文学理论来指导我们自己的文学实践，还美其名曰是“世界视野”，实际上是一种寄生行为或殖民心理，既导致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两张皮互不相粘、文学理论萎缩、文学实践苍白的尴尬情况，同时，更会一步步扼杀我们民族的那种本有的创新能力。

那么，如何立足文本进行文学批评和文论研究呢？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首先在研究态度上一定要具有人文关怀和文化关怀的意识，要多关注本土文学实践和文学文本，要坚决杜绝那种把西方在特殊情境中生成的思潮术语饥不择食地搬来，未经选择、消化、质疑，更未潜心去融会贯通，便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到处套用的做法。杨义先生曾经说，我们对西方理论不能一味消极地接受，不能图个省心去生搬硬套，需要再回到我们文化的原本的地方，了解我们中国的作品中最精彩的东西是什么——要是不看到这个东西，就把我们的本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东方智慧给抹杀了。中国学者有责任从我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学经验和文化智慧中，发掘出具有现代价值和鲜活的生命力的学理和学说，用以丰富现代人类的总体智慧。^[5]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深沉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关怀的意识，杨义先生不惜皓首穷经，沉埋于故纸堆中，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比如他对叙事学的研究。杨义先生不像其他叙事学研究者，“对我国漫长的叙事文学传统不加深究”^{[6]①}，只轻松地把西方的叙事理论拿过来就了事，“满足于给西方的叙事理论提供一点例证”^{[6]②}，他用整整10年时间，遍览我国古代所有的叙事文本，“几乎每天须读一本书。月复一月从图书馆搬运回来的书，压断了我缝了又缝的书包带，……”^{[6]③}这样年复一年的文本细读，杨义“钩玄提要，梳理爬抉，发现了不同于西方叙事的我国叙事的文化密码”^{[6]④}。当然，杨义也读西方的叙事理论，但他“是带着数以千计的古今叙事典籍的阅读感受，去领略西方的叙事理论体系的。”^{[6]⑤}经过中西对读，“我愈来愈感到从西方文化系统中生长出来的叙事学理

论，并不能涵盖中国数千年积累起来的叙事经验和文化智慧。”^{[6]⑥}这种立足本土文本，同时又具有中西文化的视野，使得杨义的叙事学著作，完全不同于当时其他的叙事学论著^⑦。他的任何一个观点都是建立在中国本土的文本之上，他的叙事理论是从中国叙事文本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深入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土壤之中。它所具有的创新性和生命力，是其他照搬西方理论或者说脱离文本天马行空胡乱演绎出来的所谓理论绝对不能比拟的。

立足文本进行文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对文本细读法的提倡。“细读”法(Close Reading)是英美新批评所提出的一种科学、客观的阅读方法。它通过对文学文本字、词、结构以及语境等的细致分析来弄清文本的象征、隐喻意义。美国人古尔灵将细读描述为三个过程：一是“了解词的多重意义，甚至了解像词典里所追溯的词源意义，能为了解作品内容提供重要的线索。”二是“掌握了作品中个别词语的意思之后，还要找出结构和模式，即词与词之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必须辨认的还有语境(如一首诗里的讲话人的天性和个性)”^[7]。很显然，通过细读，可以明确地把握文学文本的客观意义。但是，英美新批评的这种“细读”，由于它把文本视为一个独立封闭的系统，企图以一种逻辑的、准确的、细密的的操作方法来保证对文本阐释的客观性，不顾斩断文本与作家、读者以及社会生活的联系，这样就必然会陷入文本惟一论和形式主义的巢穴。(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的以文本的语言结构作为理解文本依据的文本中心论最终走向了衰落。)而且这种仅仅从文本的字句出发，从文本的语言中寻找真理和意义，还会导致对文本进行过度阐释^⑧。而我们所主张的立足文本进行文学研究，还并不能满足于“新批评”式的“细读”，我们应该有一种更加开放的视野，既有对文本的语言结构方面的诠释，同时又要将文本还原到它所生成的整个历史语境中，对它进行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美学的感悟，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去解读把握文学文本的审美意蕴。比如闻一多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即很好地实践了这一方法。在《楚辞校补·引言》中，闻一多曾经给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定下了三项课题：①说明背景；②诠释词义；③校正文字。这三项课题中，“校正文字”和“诠释词义”基本上是一种“细读”的方法，但是，在闻一多那里，这两者都只不过是手段而已，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说明背景”，是要在“读懂”的基础上，再结合其它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文化阐释，深入到古典文学作

品的最潜深处。譬如他对《诗经·3有梅》的解读,就是首先从该篇最有歧义的“3”字的解释入手,他花了很大工夫,通过多方引证,提出“3即古抛字”。接着,他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考证古人为什么要抛梅子,抛梅子有什么深层含意。他据《卫风·木瓜篇》“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的相关记载,认为“3有梅”可能与“投我以木瓜”相似。闻一多说,女方追求男方,如果投之以木瓜,就是表示愿意以身相许的意思。如果男方亦愿意接受这段感情,就以琼琚相报以定情。因此,报琼琚者,是男报女;而“3有梅”之3者为女,是女追男,女以梅3男,是女求士之法。因为梅与木瓜、木桃、木李同属瓜品。闻一多说:“疑初民习俗,于夏日果熟时,有报年之祭,大会族人于果园之中,恣为欢乐,于是士女分曹而坐,女竟以新果投其所悦之士,中焉者或解佩玉以相报,即相与为夫妇焉。”^[8]为了增加这种推测的可信度,他还列举了《晋书·潘岳传》中记载的潘岳少年时因长相俊美妇人见到都投之以果的故事,作为这种古代民俗的例证。那么,“3有梅”中的“梅”又包含着怎样的文化意味呢?闻一多又从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视角进行了探讨。他说,原始初民寻找粮食,根据男女体质的不同,男子专门狩猎,女子则采集瓜果菜蔬,所以蔬果相沿为女子所有。果实为女子所有,则女之求士,以果为贄,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接着,闻一多进一步指出,女以果实作为求偶的媒介,亦是兼取其繁殖性能的象征意义的。而且,梅作为一种果实,与女子的关系就更加不同一般。从字源上说,梅字从每,每母古同字,而古妻字亦从每从又。因此,闻一多认为,在古代,梅每母妻本属同字。梅,就是为人妻为人母之果。至此,诗中女之求士以梅为贄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闻氏的这种古典文学研究,能够立足文本,但又不局限于文本,或者说不把文本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有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显然比西方所谓的“细读”法要高明得多。这对我们今天立足文本进行文学批评和文论建设的启发也是非常深远的。

立足文本进行文学研究和文论建设,我们可以尝试着创建一种现代感悟诗学。几年前,杨义先生在《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一文中,曾经明确提出中国传统诗学是一种感悟诗学,因为感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杨义认为应该在中国现代也建立一种充满现代性的感悟诗学——这是建立中国原创诗学的有效途径。杨义说,“我非常重视

直接面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用自己的悟性进行真切的生命体验,从中引导出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萌芽、理论思路和学术体系来。……要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和文艺学,就要以中国自身的经验和智慧作为立足点,从感悟出发,用文学智慧的原本性和渊博性来托起文学理论的原创性。”^[2]当然,现代意义上的感悟有别于古代,应该是“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是感性与理性的中介,同时是二者的混合体,是桥梁”,是一种“理性的直觉”或“直觉的理性”,因此,现代感悟诗学应该既能立足于本民族的重感性的诗学传统,又要通融于西方的理性诗学^[9]。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立足文本建构现代感悟诗学的一种尝试。众所周知,王氏《人间词话》是运用传统诗话的方式对古代诗词进行批评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中的每一个观点都是从具体的诗词文本中感悟而来的,譬如他对“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解说就结合了“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等诗句。对“隔”与“不隔”的界定也是通过陶渊明、谢灵运、苏东坡、姜夔诸家的诗词来阐释的。最为关键的是,《人间词话》的整个行文中很明显地渗透了中国传统的感悟思维的方法,但又糅合了西方的理性思维的成分。比如王氏按西方的分类法把境界分为“造境”“写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但他又不是简单地分类,而是“融合艺术之心和天地山川人事之体验”,“融合读者与作者、艺术与人生多重视境”,“把境界作为一个联系着艺术本质的、可内敛、可外射的精神过程”,这样,即使是很抽象很机械很西方化的分类,也“散发着中国诗学和感悟思维的灵性与趣味”^[9]。当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完成于海禁初开的20世纪初,还是一种近代形态的感悟诗学。我们当下文学研究完全可以在中西打通的宏阔视阈中,在立足文本进行文学批评和理论提炼的时候,更多地运用本民族独有的感悟思维,也更好地糅合西方理性思维的一些成分,建立起一种充满现代性和原创性的感悟诗学。

要之,吴义勤指出的当前文学批评所患有的两种症候,如果我们能够正视问题,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改变那种浮夸虚化的研究作风,具有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老老实实在地立足文本进行文学研究,

从文本中提炼生成新的理论,又老老实实在地运用新的理论去解读新的文本,当下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要取得创新,中国文学理论要具有原创性,也并不是一件不可企及的难事。

注释:

- ① 当时的叙事学著作还有张寅德的《叙述学研究》(1989年)、徐岱的《小说叙事学》(1992年)、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年)、胡亚敏的《叙事学》(1994年)等,这些大都是对西方叙事理论的译介,其中也涉及到中国文学作品,但仅仅是西方理论的例证而已。
- ② 所谓过度阐释,是指解读文本时,仅从文本的语言结构出发寻找文本的真义。主要有两种情况存在:一种情况是阐释者在文本中寻找某种偶然性,或将文本中某些字句偶然地联系在一起,或将文本中的某些与现实相关的事实抽调出来,以此作为依据,重新对文本进行解释;一种情况是阐释者以自身的环境作为评价文本的标准。

参考文献:

- [1] 吴义勤. 批评何为? ——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候[J]. 文艺研究, 2005, (9): 5 - 11.
- [2] 杨义. 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世纪回顾和总结[J]. 学习与探索, 2002, (6): 93 - 96.
- [3] 厄尔·迈纳. 比较诗学[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4] 刘若愚. 中国的文学理论[M].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5.
- [5] 杨义. 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OL]. www.literature.org.cn; .Article.asp? ID=2317.2006-08-01.
- [6] 杨义. 中国叙事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 [7] 王先霈, 王又平. 文学批评术语词典[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 [8] 闻一多. 诗经通义[C]// 闻一多全集(第2卷).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
- [9] 杨义. 感悟通论(下)[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 (2): 96 - 113.

Text: The focus of innovation in literary review

OUYANG Wen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an ordinary phenomenon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is divorced from text. The scholars are keen on deducting the empty theories. To change the grandiloquent way in the literary review, we must cultivate a humanistic consciousness on the base of text and try to set up a modernistic and aboriginal empathic poetic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close reading.

Key words: text; humanistic consciousness; empathic poetics; innovation

[编辑: 苏慧]